

# 文艺理论参考资料

民族特色论文专辑



青海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 编

##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民族文艺	21
列宁有关民族和民族文艺的论述	28
毛泽东论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	36
周恩来论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	52
鲁迅论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	56
茅盾论文学的民族形式	64
周扬论民族形式、民族化	74
赵树理谈中国民间文艺传统的特点	78
艾芜谈文学中国化及民族形式	84
孙犁谈“乡土文学”	89
新诗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初探	安 旗 92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	唐 弼 101
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特色	张恩和 130
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特色	朱宜初 147
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苏国荣 170
新时期文艺要坚持民族性	贺敬之 188

奋发努力开创民族器乐艺术新局面 ..... 周巍峙(193)

旧话重提

——民族性和民族化琐见 ..... 王朝闻(209)

民族化——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 ..... 郑伯农(216)

电影民族化三题 ..... 罗艺军(222)

关于小说民族化的浅见 ..... 刘绍棠(228)

继承与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 贺绿汀(232)

现实主义和民族风格 ..... 蓝天野(236)

大有可取 大有可为

——谈谈电视剧的民族化问题 ..... 李准(242)

怎样表现民族特色 ..... 李乔(248)

浅谈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色 ..... 汪承栋(251)

# 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民族、民族文艺的论述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八四四—一八四五  
年）全集第二卷第194页。

“部落”和“民族”严格说来并不是等同的东西；在氏族制度下，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开始产生。……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一八八一年五月—一八八二年二月）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96页。

……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最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马克思的演说）。全集第四卷第409—410页。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全集第四卷第488页。

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全集第十六卷第440页。

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铸成它自身的锁链。

《马克思给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一八七〇年一月十六日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101页。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恩格斯的演说）。全集第四卷第410页。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

一些大民族——法国人、北美洲人、英国人——不论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在竞争方面和科学方面，都是经常互相比较的。像德国人一样的害怕比较和竞争的小商人和市侩，总是躲在他们的哲学商标制造家们给他们制造的不可比较这个盾牌后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艺术》，一，第292页。

只要知道某一民族使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用具或装饰品，就可以臆断地确定它的文化水平。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预备手稿。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  
《论艺术》一，第137页。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既有的、直接摆在他们面前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好象噩梦一样压迫着活人的头脑。正当人们好象是从事于改革自己和周围事物，创造亘古未有的事物的时候，正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的时代，他们用尽心思地召唤过去的幽灵来为自己效力，向他们借用名称、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古代尊贵的服装，并且用外来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使死人复活起来，是为了赞扬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赞扬想象中的既定的任务，而不是为了避免这个任务在现实中的解决，——是为了重新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使它的幻影重新游荡起来。

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论艺术》一。第187—189页。

一般讲来，私有制的统治是从土地占有制开始的；土地占有制是私有制的基础。但是在封建土地占有制之下，占有者至少显得好象是占有地的君主。同时在那里从外表上看来，仿佛占有者和土地之间还有着一种比单纯物质财富的束缚更为亲密的关系。地段同它的主人一起个性化了，它有了主人的男爵的或伯爵的封号，有了他的特权，有了他的司法权，有了他的政治地位等等。地段好象是它的主人的无机的身

体。由此而有这句谚语：“没有无主人的土地”。这句话表现着主人的权力和占有地的连根生长。……凡是属于这种土地所有权的人，与其说他和自己的祖国有关系，倒不如说是和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关系。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速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的时候，必须时刻把那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质变革，同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简单说来，思想形式——区分清楚。正如不可以根据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判断这个人，同样也不可以根据这类的变革时代的意识去判断这类的变革时代。恰恰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现存的冲突中去加以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艺术》一。第131—132页。

……那些家族般的公社是奠基于家庭工业上，奠基于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业的特殊结合上，这种结合使他们都能够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把纺工放在了兰开夏，把织工放在了孟加拉，或者把印度的纺工和织工都一扫而光了；这种干涉摧毁了这些细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它破坏了这些公社的经济基础，从而引起亚洲所经历过的最大的、说实话也是唯一的社会革命。

不管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家长制的无害于人的社会组织拆散了、解体了、被投到苦海里去了，令人感到多么不愉快，不管看到它们的个别分子同时丧失了自己古老的文明形式和祖传的生存手段，令人感到多么难过，我们却不应该忘记：

这些淳朴的农村公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它们把人的头脑局限在最狭窄不过的范围内，使它成为驯服的迷信工具，把它当作传统规则的奴隶，使它丧失全部伟大精神和历史首创作用。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人们的野蛮的利己主义，他们粘在可怜的一小片土地上，泰然自若地观望者巨大帝国的没落，观望者难以容忍的残酷行为的进行，观望者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他们观望这一切事情如同观望自然现象一样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同时只要任何侵略者肯垂顾他们，他们自己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获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毫无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生活，这种消极的生存方式，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引起了狂暴的、无目的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为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细小的公社是被种姓的划分和奴隶制度所玷污了，这些公社强迫人服从外在环境，而不把人提升为外在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着的社会状况转化为永不变动的自然命运，从而引起野蛮的对自然的迷信，这种对自然的迷信的卑贱性质表现在：作为自然主宰的人竟向猴子哈努曼和牝牛撒巴拉虔诚地叩头。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煽起了社会革命，完全是为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在坚持这些利益的方式上是愚蠢的。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如果亚洲社会状况方面没有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如果不能，那末不管英国犯了多大的罪，它在引起这个革命上却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样，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的情感是怎样难受，可是从历史观点看来，我们有权利同歌德一起高唱：

这痛苦还要折磨我们吗，  
既然它增加了我们的快乐？  
千千万万的灵魂不是  
已经被帖木耳的统治所吞噬了吗？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论艺术》一，第302—304页。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好象构成社会组织骨骼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例如，希腊人同现代人比较，或者是莎士比亚同现代人比较。关于艺术的某些形式，例如史诗，甚至谁都承认，只要艺术生产本身一旦开始之后，它们就决不能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形式下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里，某些具有巨大意义的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中未发展的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艺术领域内各种艺术样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话，那末整个艺术领域对于一般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是这样情形，这就更不足惊奇了。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赋予自然力以形体；因此，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希腊艺术的前提希腊神话，即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这是希腊艺术的资料。……

但是，困难并不在于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是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形态相关联的。困难是在于了解它们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

一个大人是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孩子气

了。但是，难道自己的天真不令他高兴吗？难道他自己不应当努力在更高的阶段上把小孩的真实的本质再现出来吗？难道每个时代固有的特性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毫不矫饰地复活着吗？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童年，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对于我们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世界上有着没有教养的儿童，也有着早熟的儿童。许多古代的民族是属于后一种范畴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所由产生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地，它是这个未发展的社会阶段的成果，而且是与下述情形分不开的，即是，希腊艺术所由产生而且只有在其下才能产生的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永远不能复返的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艺术》一，第194—197。

……顺便讲一下，在阿尔及尔，摩尔人被称为阿拉伯人，他们有一小部分离开了沙漠和自己的村庄，同欧洲人一起住在城市里。他们的身材比中等法国人高些，他们的脸是椭圆形的，鼻子象鹰钩一样，眼睛大而闪光，头发和胡须是黑黑的，而皮肤的颜色呈现着从几乎白色到深的青铜色的各种细微差别。他们的衣服——那怕是破烂的——是漂亮而又雅致的：罩衫（或长袍）多半是薄薄的白色丝绸长衣或带有风帽的斗篷；为了掩护头部（在气候不好、天气炎热等等的时候，他们也使用风帽），他们戴上丘尔邦或系上白色的凡尔纱；平常他们总是赤着脚，不穿靴子，只是偶尔穿上黄色或红色的山羊皮便鞋。

最差的摩尔人在披斗篷的艺术上以及在显得自然、风雅和十分高贵的本领上超过了最伟大的欧洲演员——不论他是

迈步走路或坐着不动（当他们坐上自己的骡子或毛驴或者极其稀罕地坐在马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不是象欧洲人一样跨骑在牲口的背上，而是把双脚吊放在一边，显出极其完美的懒洋洋的沉入幻想的姿态）。

马克思：一八八二年四月六日给燕隆格的信。《论艺术》一，第292—293页。

……古代人就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无论如何，这在他们那里只是极小程度的现象。广泛发展的收集真正宝物的习惯证明：他们有多少剩余产品全然没有消费。他们把很大的一部分产品消费在非生产的支出上面，使用在艺术作品、宗教事物和社会事业上面。……如果在古代人那里没有生产过剩，那末在那里是有富人们的过度消费的，他们在罗马和希腊的末期蜕化到疯狂挥霍的地步。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论艺术》一，第249—250页。

金银不仅在消极方面是多余的、可以省掉的对象，而且它们的审美特性使它们成为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的自然材料，一句话，成为剩余品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天然的光彩，因为银反射出原来混合着的一切光线，金反射出最强烈的色彩——红色。一般讲来，色彩的感觉是美感的最普及的形式。雅可布·格林证明了印度日尔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重金属名称和色彩关系的字源联系（见《德国语言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艺术》一，第248页。

桑丘以为，仿佛拉斐尔创作自己的绘画是跟罗马当时存在的分工毫不相干的。假如他把拉斐尔跟列奥纳多·达·芬

奇和提威安诺比较一下，他就会看出，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依存于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的罗马的繁荣，列奥纳多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依存于佛罗伦萨的环境，而后来提茨安的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依存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就象其他任何艺术家一样，拉斐尔是被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当地的社会组织和分工状况制约着的，最后，是被与当地交往的全国的分工状况制约着的。象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发挥自己的天才——这完全决定于需要，而需要又决定于分工及其所产生的人们受教育的条件。

施谛纳宣布科学劳动和艺术劳动是唯一者的事情，他在那里就大大地低于资产阶级的水平了。现在已经承认必须组织这种“唯一者的”活动。假如奧拉斯·韦尔纳把他的画看作“只有这种唯一者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那末他连创作他的画的十分之一的时间也没有了。巴黎对轻松喜剧和长篇小说的大批需要，产生了写作这些东西的劳动组织，——这种劳动组织的成品无论如何比它在德国的“唯一的”竞争者要好些。在天文学中，象阿拉戈、赫舍尔、艾恩克和塞贝尔这样的人都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协同观测，并且只是在组织起来之后才获得若干可以过得去的成果。在历史编纂学中，“唯一者”是绝对不能做出一点东西来的，而法国人在这方面由于有了劳动组织，就早已超过其他民族了。但是，很明显，这一切以现代分工为基础的组织不过只获得极其有限的成果，它们仅仅同以前狭隘的孤立状况比较起来才算是前进了一步。

.....

分工的结果是：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而在广大群众身上则被压抑下去。假如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出色的画家，那就决不会排除每一个也

可能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所以“人的”劳动和“唯一者的”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无论如何在共产主义社会组织中，消除了完全从分工而来的艺术家对于地方和民族的局限性的屈服，也使得艺术家不要禁闭在某一艺术的范围内而仅仅作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所以单是他的活动的一个名称就充分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于分工的依赖性。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画家，而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艺术》一，  
第355—356页。

分工之成为真正的分工，只是从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分这一瞬间开始的。从这一瞬间起，意识能够现实地想象到：它是一种与对现有的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想象什么现实的东西，也能现实地想象一种东西，——从这一瞬间起，意识就能够从世界下面解放出来，转而构成“纯粹”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与现存的各种关系发生矛盾，那末，其所以能发生，仅仅是由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与现存的生产力发生矛盾。但是，在一定民族的关系范围内，其所以也能发生，是由于矛盾不是表现在这一民族范围内，而是表现在这一民族的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一般意识之间（目前德国就是这样的情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艺术》一，  
第209—210页。

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修造巢穴或住屋，就象蜜蜂、海狸、蚂蚁等等所作的那样。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

大崽子所需要的东西；动物是片面地生产的，然而人是普遍地生产的；动物只在直接物质需要的支配下才生产，可是人甚至摆脱物质需要的时候也生产，并且只在摆脱物质需要的时候才真正地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动物的产品直接与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和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造成东西，可是人善于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到处善于对对象使用适当的尺度；因此，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成东西的。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艺术》一，第225—226页。

生产不仅供给需要以物质，而且也供给物质以需要。……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由对于对象的感受所造成的。一件艺术品——任何其他的产品也是如此——创造一个了解艺术而且能够欣赏美的公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艺术》一，第207页。

反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反对现代各个民族的过去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余波仍然继续威胁着这些民族。对于这些民族讲来，看到在他们那里经过自己悲剧的旧的制度现在如何通过德国的鬼魂在扮演自己的喜剧，是很有教益的。  
.....

历史是认真地行动着的，经过许多的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着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式

地受了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路喀阿诺斯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新死一次。历史的进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权争取的也正是这种愉快的历史结局。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艺术》一，  
第76—77页。

黑格尔在某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的事变和人物，都是出现两次。他忘记添加道：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出现。

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纪》。《论艺术》一，第77页。

资本主义生产对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是敌对的，例如，对于艺术和诗歌就是如此。如果不考虑到这点，就可能得到十八世纪法国人的被莱辛如此绝妙地嘲笑过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上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古代人，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史诗来呢？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第四卷）。《论艺术》一，  
第273—274页。

资产阶级由于榨取全世界的市场，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物质生产上是如此。在精神生产上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从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中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论艺术》一，第260—262页。  
(《民族文艺论丛》八一年试刊号)

我们愈深入古代，同一起源的各个民族互相不同的特征就愈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如果我们研究的是远古的历史，这些史料会愈来愈少，而且只包含着最本质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也是由各个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一个部落的各个支系愈少离开自己的本源，它们彼此便愈接近，相似的地方便愈多。雅可布·格林始终有充分的理由把从记述了金夫勒族远征的罗马历史家到亚当·布列门斯基和萨克逊·格拉马蒂克的一切历史证据，把从《皮奥伏尔夫》和《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一直到《埃达》和古代传说的一切文献，把从*Leges Barbarorum*〔野蛮的真理〕到古丹麦法规和古瑞典法规和日耳曼习惯法的法学汇编，都看作是对于研究德国的民族性格、德国的习惯和法权关系具有同样价值的史料。这种或那种特殊性可能仅仅具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性格却同样是整个部落所固有的，所以史料愈古，这些地方性的差别便消失愈多。

恩格斯：《英格兰和爱尔兰历史手稿》，《论艺术》二，第68页。

说一本书是民间故事书，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极大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权利对于这类书抱着很大的期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而且按其价值来说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是无可非

议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因此，如果能公正地要求民间故事书的一般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诗的内容，饶有风趣的机智，十分纯洁的心地，而德国民间故事书还应该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国精神——即在任何时代都是完全一样的特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权利要求民间故事书应该符合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民间故事书了。

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论艺术》四，第401—402页。

最后，辩论人是否以为自由出版物的民族缺陷就不是书报检查官的民族缺陷呢？难道书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不接触到时代精神吗？很可惜，也许正是这样。但是，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出版物的民族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和反时代的罪过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论艺术》四，第199页。

究竟什么东西最主要呢？难道人类的发展不是高出民族的发展吗？

恩格斯：《艾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论艺术》四，第324页。